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内蒙古师范大学
八十周年校庆
80TH ANNIVERSARY

史記文學成就論衡



SHIJI WENXUE
CHENGJIU

可永雪◎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史記文學成就論衡



SHIJI WENXUE
CHENGJIU

可永雪◎著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文学成就论衡/可永雪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660 - 0175 - 7

I. ①史… II. ①可… III. ①史记—文学研究
IV. ①I207.62②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2895 号

《史记》文学成就论衡

作 者 可永雪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封面题签 李志平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春飞无限彩色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6

字 数 40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175 - 7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我研究《史记》，先是在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史记》研究”专题课的基础上，于1991年编著出版了《〈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十年之后，根据教学和科研中一些新的心得体会的积累，于2001年对《〈史记〉文学成就论稿》进行修订，改名《〈史记〉文学成就论说》重版。现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学术进展很快，我希望把这十年来学界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自己对《史记》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所形成的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增补进去，再出一个修订本，命名为《〈史记〉文学成就论衡》。所谓论衡，是想对《史记》在文学上最重要、最核心的成就究竟是什么？它所做的独特贡献和主要价值又在哪里？它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究竟处在一个什么地位等等问题，能够给出一个比较恰当、比较科学的回答。当然，这个衡定，也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

这次重新修订，变动较大。

（一）在全书各章前加“绪论”，主要论述近年来我研究《史记》所形成的两个新的观点：“《史记》——一部形象的中华民族心灵史”；“《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曲伟大的人的赞歌”。所以把它们放在绪论的地位，是因为这样的观点将统领全书，贯穿全书。

（二）第一章《史记》文学性界说，对于把《史记》作为文学来看待、来研究的著作说，很有必要，原来的那些说法、论点也并不错，所以基本保留。只是加了以“绪论”所说两个新观点为统领的理由和说明。

（三）第二、三两章，关于司马迁的时代生平与思想，关于《史记》的写作和成书，主要是把属于一般常识性而其他许多著作已讲到的部分尽量压缩，增添一些新的科研成果和内容。

（四）第四、五、六3章作为重点，扩充改写，如第四章写人艺术之“第三节《史记》在典型化方面的创造”下面的两个小标题，改为“一、

《史记》写人的创作过程；二、《史记》典型化的基本方法”，并增加“第七节《史记》在写人写心上的开创及这种开创的意义”，在内容和观点上有新的补充；第五章叙事艺术新列“第四节《史记》对艺术构思的自觉和追求”，分立“一、《史记》的故事性；二、《史记》的戏剧性；三、艺术构思的自觉追求与中国戏剧艺术的先声”三个小标题。

（五）第七、八两章，主要是对司马迁在再创作过程中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实际是怎么处理的，特别是如何运用“选择”与“虚构”这两种方法的实际状况及有关经验与启示做了论述。

全书注重实证，故举例较多，例证力求具有典型性，一以见说必有据，一以备有为者的採择。

书尾将原《〈史记〉文学成就论稿》的引言、后记，以及《〈史记〉文学成就论说》的改版前言作为附录，为的是使读者了解我著作此书的初衷及其思想、思路发展的轨迹。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史记》文学性界说	(12)
第一节 前人对《史记》文学性认识的历程	(13)
一、汉魏至六朝——这一时期,司马迁被许为“文章”家,《史记》 被包括进广义的文学范畴之内	(14)
二、唐代——司马迁被视为散文大家,《史记》被树为古文典范, 从而奠定了司马迁和《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	(15)
三、宋代——开始出现从人物形象、文学创作角度对《史记》的 艺术价值进行评论和阐发的论著	(16)
四、明清——对《史记》文学创作的特质得到更深入的认识和 更明确的阐发,对《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特性有了明确 的认识和厘定	(17)
五、近现代——对《史记》的文学性从整体上获得了本质性的 认识	(19)
第二节 今天应如何看待《史记》的文学性	(21)
一、从写什么,即从所写内容对象上看	(21)
二、从为什么写,即从写作的目的动机上看	(24)
三、从怎么写,即从表现方式、创作方法上看	(26)
四、从它的效果,即从作品的作用上看	(28)
第三节 《史记》文学性的几点界说	(28)
第二章 司马迁的时代、生平与思想	(33)
第一节 司马迁的时代	(33)
一、司马迁的时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又是一个社会矛盾激烈发展 的时代	(33)

《史记》文学成就论衡

二、司马迁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基础已经稳固,正积极构建自己相应的 上层建筑的时代	(38)
三、司马迁的时代是一个呼唤天才也产生了天才的时代	(39)
第二节 司马迁的生平	(40)
一、司马迁的家教与师传	(40)
二、司马迁的壮游与入仕	(41)
三、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	(42)
第三节 司马迁的智能结构	(43)
一、司马迁的德、才、学、识	(43)
二、钟中华民族文化灵秀于一身的天才	(45)
三、司马迁成长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决定因素	(47)
第四节 司马迁的禀赋和气质	(48)
一、司马迁的文人和诗人气质	(48)
二、司马迁的感受力和想象力	(50)
三、司马迁的形象思维	(51)
第五节 司马迁的思想与人生价值取向	(52)
第三章 《史记》的写作、成书与价值	(58)
第一节 《史记》的写作和成书	(58)
一、《史记》的资料来源	(58)
二、《史记》的组织体例	(63)
三、《史记》的缺佚与补窜	(67)
四、《史记》的断限和名称	(71)
五、《史记》的流传及注释、版本	(75)
第二节 《史记》的史学贡献与文学成就之间的关系	(81)
一、中国古代文史不分的传统	(81)
二、《史记》在史学上的伟大贡献——创立以人物为中心的 纪传体	(83)
三、《史记》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开创传记文学	(85)
四、《史记》的著作宗旨和“成一家之言”	(87)
第四章 《史记》的写人艺术	(90)

第一节 《史记》在写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对先秦文学的 继承和发展	(90)
第二节 《史记》在形象性方面的推进	(96)
一、在历史叙述中加进了更多形容描写的成分	(99)
二、司马迁的写生,能令人物逼真传神	(102)
三、《史记》的形容渲染,能造成浓郁的氛围和意境	(104)
四、《史记》的呈现性叙事	(105)
第三节 《史记》在典型化方面的创造	(107)
一、《史记》写人的创作过程(从选择传主,提炼主题到 “互见法”等等)	(108)
二、《史记》典型化的基本方法(以“实录”为基础, 以选择为主要方法,包括虚构在内的各种方法和手段)	(127)
第四节 《史记》的细节描写	(130)
一、《史记》细节描写的几个特点	(132)
二、细节描写的作用与司马迁为什么这么重视细节描写	(137)
三、《史记》与先秦史传细节描写之比较	(140)
四、《史记》借轶事传神	(144)
第五节 《史记》的心理描写	(149)
一、《史记》在心理描写上的拓展	(149)
二、《史记》心理描写所达到的高度	(159)
三、《史记》心理描写获得高度成就的根源	(173)
四、《史记》心理描写的民族特点	(174)
第六节 《史记》对传主“为人”的关注	(176)
第七节 《史记》在写人写心上的开创及这种开创的意义	(180)
一、写人——写心——写魂的写人指向	(180)
二、“想见其为人”——作为一种创作路径	(181)
三、“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司马迁的一则写作信条	(183)
第五章 《史记》的叙事艺术	(187)
第一节 前人对《史记》叙事成就的高度评价和广泛研究	(188)

《史记》文学成就论衡

一、刘向、扬雄等称司马迁“善序事理”	(188)
二、柳宗元以“洁”称许《史记》	(189)
三、吕祖谦等论《史记》“寄意于笔墨蹊径之外”	(191)
四、归有光《评点史记》“例意”和方苞的“义法”说	(192)
五、顾炎武的“寓论断于叙事”说	(195)
第二节 《史记》在文章章法方面的主要成就	(197)
一、谋篇布局	(197)
二、条理脉络	(199)
三、虚实详略	(205)
四、转接呼应	(209)
五、对比映衬	(211)
第三节 《史记》的结构艺术	(214)
一、《史记》的总体构架	(214)
二、《史记》人物传记的结构方式	(217)
第四节 《史记》对艺术构思的自觉和追求	(224)
一、《史记》的故事性	(225)
二、《史记》的戏剧性	(231)
三、艺术构思的自觉追求与中国戏剧艺术的先声	(242)
第五节 《史记》的场面描写	(252)
一、司马迁为什么这么重视场面描写	(252)
二、《史记》都写了哪些场面	(253)
三、《史记》场面描写的艺术魅力何在	(255)
四、《史记》场面描写的纵横关联谈	(258)
第六章 《史记》的语言艺术	(260)
第一节 《史记》语言的两大源泉	(260)
一、司马迁对古代书面语言的继承和加工	(260)
二、司马迁热心学习和提炼民间口头语言	(265)
第二节 《史记》语言的散文化和口语化	(268)
一、散句单行,严格意义下的纯正散文	(268)
二、《史记》的短句	(269)

三、《史记》的长句	(274)
四、长短相间、参差错落之美	(282)
五、《史记》的句式特点	(285)
第三节 《史记》语言的表现力	(288)
一、《史记》语言的文学性	(289)
二、《史记》语言的重沓、加倍形容和用虚字传神	(293)
三、《史记》的讽刺语言和讽刺艺术	(298)
第四节 《史记》的叙事语言、抒情语言、议论和论断语言	(303)
一、《史记》的叙事语言	(303)
二、《史记》的抒情语言	(309)
三、《史记》的议论和论断语言	(315)
第五节 《史记》的人物语言——人物语言性格化	(321)
一、中国古代人物语言的深厚渊源	(321)
二、《史记》人物语言在作品中的比重	(322)
三、古代学者对于人物语言的研究	(324)
四、《史记》在人物语言上的宝贵贡献——性格化语言的创作	(325)
第六节 《史记》的语言风格	(332)
第七章 关于《史记》中的再创作问题	(338)
第一节 何为再创作	(338)
第二节 《史记》再创作的基本面貌	(340)
第三节 《史记》再创作的主要特点	(367)
第八章 作为传记文学来看的《史记》	(374)
第一节 《史记》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	(375)
一、司马迁高度重视历史真实性问题,自觉维护历史的真实性 ...	(376)
二、司马迁又不可避免地冲破史学域限,使用了想象虚构等 文学手段	(378)
三、《史记》处理两者矛盾关系的原则和关键	(383)
第二节 《史记》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具体方法	(387)
一、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387)
二、如何处理写事与写人的关系	(389)

《史记》文学成就论衡

三、如何处理篇幅与内容的关系 (392)

四、如何处理作者与传主的关系 (394)

附 录

《〈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引言 (398)

《〈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后记 (399)

《〈史记〉文学成就论说》改版前言 (401)

绪 论

我常常慨叹于我们这辈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说我们这一代，比起上一辈学者来，既缺少经、史、子、集等国学根柢的修养，又遇上了太多的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浪费了太多的宝贵时光；更常常慨叹于个人资质的愚钝，《史记》搞了这么多年，越搞越觉得我们现在所达到的对《史记》的一些认识和所做出的一些阐释，离《史记》所实有的成就和水平，都还存在一段很大的差距——这在文学方面显得尤其突出。

我所痛感的我们对《史记》的认识和阐释，离《史记》所实有的成就和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的问题，似乎不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据我所知不少同志也抱有同感，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史记》学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不用说别的，首先在对《史记》的总体估价和定位上就存在不同的说法和分歧。

一是梁启超的“超史”说。梁氏在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上海中华书局，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版）一书指出，从前史家，很少“为作史而作史”，“大率别有一种‘超史’目的”。具体到《史记》，他说：“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二是上世纪几乎成为许多学者共识的《史记》具有“百科全书”性质说（或《史记》是“百科全书式的一部书”说）。此说在学界几乎众所周知，这里不必多说。

三是袁传璋先生在其《太史公著作考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一书中提出的《史记》是“一部论治的经书”说。袁先生认为：

“这部著作像《春秋》一样，是一部论治的经书。司马迁的抱负并不是要做史学家，更不是要做文学家，因此，即使在史学家和文学家头衔上加以‘伟大的’桂冠，亦并未真正确当地褒美司马迁。将《史记》定位为正史鼻祖和文章大宗，也未能真正体现出《史记》的价值与光辉。”袁先生还说：《史记》在中华古代典籍中，“是唯一一部可以横跨四部的巨著”，“讲论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以上三说，在对《史记》的定性定位上，观点显然不同，然而三者却有一个明显的共同趋向，这就是《史记》绝不只是一部史书，它的内质、内涵远远超出史书的范畴，它多质共存，包蕴着更多、更深刻和更宝贵的东西。

我以为，这三说者的共同的总体感觉是对的，有价值的，它等于昭示人们：对《史记》的深层开掘还大有空间！

我自己在这条道路上的探索，近年来得到两个收获，或曰两个发现：1. 《史记》是一部形象的中华民族心灵史；2. 《史记》乃中国历史上第一曲伟大的人的赞歌。在这里愿意质诸同道和同好面前。

关于《史记》是一部形象的中华民族心灵史。

2005年我在中国《史记》研究会韩城年会上的发言里，提出了“司马迁写人、写心，构成了一部中华民族心灵史的长卷”的论断；2007年，在中国古代散文学会永丰会议上，提交了《作为中华民族心灵史来看的〈史记〉》的论文；2009年，在中国古代散文学会武汉会议上，提交了《再论“〈史记〉：一部中华民族心灵史”》的论文。这些发言和文章所提出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认为，《史记》除了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和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之外，还是一部形象的中华民族心灵史（这里加“形象的”定语，意在与理论性、学术性著作区别，也是为更符合它的实际）。

这样说和这样认为的理由是：

1. 司马迁第一次以人类自身为主人公写出了大批人物传记，一部《史记》，足以构成一座中国古代人物形象的艺术长廊。这种“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梁启超语，见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的写法，无论在中国或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破天荒的伟大创造。

2. 司马迁的《史记》，不止述史，更重写人，使人真正占居了历史的中

心、主体；不止写人，而且写心，就是说，他的人物传记，不止记载人物的生平经历、功业成败、历史贡献和历史评价这些人的外在的社会表现，同时特别关注人物的性情为人、道德品操、内心生活和精神世界这些人的自身、人的内质等内在方面。一句话，《史记》所写的人，不止是历史的人，而且是人性的人。并且，《史记》写人，是外在、内在，历史的人与人性的人并重，“历史的人”再加“人性的人”，这两个方面合起来，才是司马迁心目中完整的“人”。

3. 《史记》所写人物，从范围上说，上自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士、农、工、商，医、卜、星、相，各行各业，各个阶层无所不包，还要加上少数民族，是涵盖和指向全体社会成员的；从空间上说，自中原到周边地区，凡是中华大地上的人群都含纳在内；从时间上说，自人文始祖黄帝起，五帝、三王、春秋、战国、秦、汉，一直到司马迁当代，历朝历代各个时期都包括在内，总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物序列。

司马迁写人、写心的指向，使他把笔触指向了人物的心魂，而他所写人物，无论从观念上、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涵盖了全社会所有成员。这样，一个个人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和细胞，而所有这些各有其性行品操、风神气韵的人物合起来，自然便能够反映和展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灵。

《史记》所写人物，又依时间先后，各朝各代顺序排列和展开，这样，自然也就能让人们看出中华民族心理心态、精神世界发展变化的轨迹，以及各个时代人们思想观念，精神面貌的倾向与特征。

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谱列民族心灵史的发展历程是一项艰巨工程，非一蹴可就，然而读过全书，其大体发展阶段和各阶段的显著特征还是历历可睹的：

五帝三王时代天下为公的观念和大公无私意识（尧舜禅让）、挺身而出为民造福的奉献精神（大禹治水过家门而不入）、以至孝化感顽邪（虞舜孝亲）、天帝神巫信仰（夏后、殷王及百姓）、家天下的独夫暴戾心理（桀、纣为代表）；周的积德累善（周后稷、文王为代表）、崇德重礼（太伯让国、祭公谋父以“耀德不观兵”谏、樊仲山甫以“废长立少，不顺”谏）。

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蔑视天子权威（郑庄公侵周地、祝瞻射王中肩）、道义沦丧（楚平王、卫宣公霸娶儿媳）、霸者风概（齐桓、晋文）；一

方面，汲汲于救世（孔子周游列国、墨子摩顶放踵）、改革意识（商鞅变法、武灵王革新）、担当胸怀（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方面，礼贤养士之风盛行（以魏文侯、燕昭王、四公子为代表）；一方面，士阶层通过个人奋斗而崛起（苏秦、张仪等策士、说客以至冯谖、毛遂等门客）；乱世英豪，剑在匣中，不甘落寂的心性（荆轲、高渐离），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急人之难，不爱其躯的侠义情怀（朱家、郭解等）。

秦汉时期，睥睨天下、雄视万代的胸襟（秦皇、汉武）、觉醒意识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陈涉、吴广为代表）、强烈的复仇与狂飚意识（项羽）、投机革命（魏豹、诸田）、自觉不自觉的反秦起义的参与者和汉帝国的缔造者（刘邦、樊哙、萧何、张良、酈生、陆贾、张苍等），还有信奉“暴得大名不祥”的古训，因而成了群众革命暴风雨中可怜企鵝的（陈婴母子）。汉王朝建立后朝廷大臣和社会上两股不同风气：一股，阿世取荣（叔孙通为刘邦“定朝仪”）、谨小慎微（万石君者流一心把皇上伺候舒服）、对上惟皇帝颜色是视，对下残民以逞（张汤、王温舒等酷吏）；一股，具有人格尊严，懂得并且坚守大臣职责，敢于坚持自己独立见解者（敢于在皇帝面前提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的张释之；敢于和景帝对抗，反对废栗太子，反对封王信为侯的周亚夫；敢于矫制“以便宜”发仓粟以赈贫民，敢于为五百名因与匈奴贸易而犯死罪的百姓辩护，敢于公然指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有“社稷臣”之称的汲黯）。宏阔昂扬，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汉初以至武帝时期）。

总之，一部《史记》，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人性的大汇展，一部《史记》，乃是由一篇篇人物传记呈现的形象的中华民族心灵史。

此外，我们说《史记》是一部形象的民族心灵史，还从理论上得到了支持。丹麦的批评家勃兰克斯说：“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第一分册第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而李长之先生说：“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第20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是的，司马迁不只为中华民族述史，而且为中华民族写魂。如果说，鲁

迅先生是第一个自觉地担负为我们民族写魂的作家的话，那么，司马迁就是最早在实践上担当起这一神圣任务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作者。我们这样说，是因为从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可以读出无数祖先的魂，我们中华民族的魂！

关于《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曲伟大的人的赞歌。

这是近年来我和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学院的刘振东先生共同感兴趣并一起探究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司马迁在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即“人的自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和所作出的贡献，并把这一点和《史记》写人的成就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大体说来自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到汉代大一统的稳定帝国的建立，是一个大的（或者说极大的）历史阶段。以后，直至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是第二个大阶段，从近代到当代可算是第三个阶段。

作为第一个大周期思想文化发展的总结归纳者，在前期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是思想文化集大成的归纳者；在后期的代表人物是司马迁，他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成果的归纳者。

人类的存在和人的认识，大体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是人的本身，人的自我。前者是外在的客观对象，后者是人内在的主体。

我们认为，认识人的自我，探索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即“人的自觉”的形成与发展非常重要，因为人的自我意识发展到什么程度，决定他对世界与社会有什么样的认识，形成什么样的观点和思想体系，并决定他在社会实践中采取什么行动。

在蒙昧时期，人尚未把自己与自然界分开，自认为仍然是自然界的一体，这可从图腾崇拜与原始的神话传说看出来。

进入文明时期，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与自然界万事万物不同的族类，也就是有了“类存在”的自觉，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在《尚书·吕刑》与《国语·楚语下》都说到颛顼时期“绝地天通”，所谓“绝地天通”，就是将人类社会与泛神的世界区别开来。

但人们并没因此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由于生产力低下和对抗自然界能

力的不足，人们转向宗教性的天命崇拜和天帝崇拜，认为冥冥中有一个主宰一切的上帝存在，决定着自己的命运。直到殷商时代，还尊神重巫，保持着强烈的神本主义，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事事要占卜，向神请示。

经过商周之际武王伐纣的革命性社会大变动，周初统治者与“敬天”并列，提出了“保民”的指导思想与“敬德”、“保民”的口号，而“保民”就是保人。当时又有“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说法，认为天也应尊重人民的意志。周人还实行文化维新，周公治礼作乐。所谓治礼作乐，就是由人来制定自己社会管理和社会行为准则，表明人的“类存在”，已经由朦胧的自觉达到了明确清醒的认识。人们的观念，慢慢从天神的笼罩中剥离出来。

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争霸，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由于各诸侯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斗争日益复杂激烈，对斗争的各方来说，天命除了被作为利用的口实，已经不起任何实际作用，凭的全是人事作为——包括治国的纲领原则与斗争的谋略权术等。于是在人的自我意识上又出现新的突破性发展和变化，其表现之一是天命神学观念动摇，思想意识由神本走向人本，出现了重人轻神思想。随季梁有“夫民，神之主也”之说，虢太史嚭有“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之论，周内史兴有“吉凶由人”之语，而以郑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话为标志，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人才是历史与社会的主宰。表现之二是以鲁国叔孙豹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标志，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在复杂的社会斗争与社会发展中人的生存价值，并开始确定生存价值的标准。表现之三是，这一时期一些精英人物开始有了独立人格的自觉，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有强烈的自信，有强烈的自主意志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孔子讲“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以“易天下无道为有道”自任。孟子讲“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表现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又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表现出强烈的担当意识。表现之四是，在春秋时期，开始真正有了独立而不是作为社会实际统治者的思想家出现，其中代表人物一个是孔子，一个是老子，他们针对所面对的社会历史情况，根据自己的认识，为社会制定符合自己理想的蓝图。到战国时代，